

清代版本散论

杨 成 凯

中国古籍版本研究以往集中于宋元本,清代印本时代未远,物非稀见,少有论述。本文以读书札记若干则,粗为条系,略述清代版本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目录版本专业工作,从事有关学术研究也值得关注。

一、版式风格

版式风格本质上是一种时尚,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在书坊集中的地区,一定时期的书籍会呈现一些共性,多少就有一种不成文的行业标准的意味。泛泛而言,构成版式风格的基本因素,一是版框大小,二是字体,三是版面黑白比例,包括行格疏密、笔画粗细和边框宽窄等。

清刻本中有代表性的版式风格,可以概括为宋体和写体两类。清刻宋体的特点是方正端庄,逐步走向我们今天的印刷宋体。写体主流宗欧,名家写样则各有体式,精彩纷呈。清刻中的精品是仿刻宋元旧本,从清中期兴起,直到民国初年,多有佳刻。

清刻宋体和写体版式随时期、地区和经办者的不同有不同的面貌,注意观察和比较版式风格有助于判断刊刻时期,这是“观风望气”的主要着眼点。如《古文苑》一书,有嘉庆兰陵孙氏仿宋刻本,光绪杨氏飞青阁曾覆刻,二本并列,字迹似乎完全相同,但是版面

观感却有差异,嘉庆本朴厚自然,光绪本则显得生硬率易。这既有原版与覆刻的关系,也有不同时期工艺技术的关系。

根据版式风格鉴定版本,不妨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六跋《重刻武英殿聚珍版七种》说,此七种书无刊刻说明,叶氏想起旧藏汪汝璥刻《书苑精华》版式相同,断为汪刻。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也曾考索此书来历,并曾请教缪荃孙,同样据版式风格定为汪汝璥所刻。

按:二家考证结论无误,七种中有《曲洧旧闻》一书,曾见一本封面有“钱塘振绮堂汪氏藏板”,末叶有刊记“大理寺寺丞职衔臣汪汝璥恭校刊”一行,足以证成二家之说。不过其中还有隐情,据顾广圻跋(见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1485页),此《曲洧旧闻》为鲍廷博所刻。顾跋本为同版别一印本,末叶无刊记,此书应该是鲍氏为汪汝璥所刻。

二、写刻略说

写刻本中不乏名家之作,如清内府刻朝廷大臣书御制诗,康熙刻林佶“四写”,乾隆刻丁敬书《冬心诗续集自序》,乾隆刻郑燮自写《板桥诗文集》,江声篆书《尚书集注音疏》、《释名疏证》,嘉庆刻余集书《续夷坚志》、《志雅堂杂钞》,沈彩手书自作《春雨楼集》,道光刻张敦仁草书《通鉴补识误》,都是鉴赏和收藏界艳称的佳刻名本。

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说,曹寅开创的欧体“康版”,刻书之精超轶前后,后世宝惜当在宋版之上。虽然此说奖誉过情,然而后世收藏鉴赏界对清代写刻本确实赞赏有加。不过我们不能不指出,对“康版”评价如此之高是就刊刻工致而言,当时影摹旧本和博考精校的风气还未兴起,用写刻方式翻印的旧籍版本却未必精善。张士俊所刻《泽存堂五种》、曹寅所刻《楝亭五种》和《楝亭十二种》,包括乾隆时卢见曾所刻《雅雨堂丛书》,虽然刊刻精美,而且不乏罕传秘本,有功学子,但是一旦取原书或别本覆勘,却发现有时擅改旧文,

有时底本不佳校勘欠精，经不起认真推敲。

项氏玉渊堂所刻各书以富丽精工为藏家所推重，夷考其实，却往往并非善本。刻《水经注》时或许未得明抄善本，然而舍明刻佳本不用，却取多有讹误的评点本，则不可理解。项刻《绝妙好词》出自康熙柯氏刻本，由于校勘粗疏，多有讹误。查为仁、厉鹗不察，据以作笺。《绝妙好词笺》从清乾隆以来一再翻印，项本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自此广为流传，沿袭至今，习非成是，败坏了《绝妙好词》的版本，学者不可不知。

三、仿刻略说

在旧籍日少、善本难得的情况下，清代兴起按照旧本样式惟妙惟肖地仿刻复制之风，出现了不少佳本。仿刻本大都是影宋，影元、影明偶见。清前期就有仿刻本，内府仿宋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和《相台五经》都很著名，陈鱣《经籍跋文》曾极口称赞。继起的朴学风推动了古书版本研究，古书旧本日益受到重视，嘉、道影刻之风盛行，黄丕烈、汪士钟、张敦仁、胡克家、吴鼐都有名刻传世。清后期张之洞提倡刻书留名，掀起刻书热潮，涌现出许多影刻精本。一般而言，清末刻本宋体不精，写刻罕见，但影刻却相当可观。

值得注意的是，仿刻本所称的底本不确。一个原因是，古书版本研究在发展之中，刻书时对版本的鉴定不一定准确，断代往往偏高。清内府所谓宋淳祐本《四书章句集注》其实是元刻本（详情似乎还可以研究），所谓宋岳珂刻《相台五经》则是元宜兴岳氏刻本。清代藏家所盛称的北宋本，几乎都非定论，如汪士钟刻所谓景德官本《仪礼疏》其实是南宋刻本。

另一个原因是刻书者的底本不是原书，而是影抄本，或覆刻本。光绪江标刻《唐人五十家诗集》号称覆南宋陈道人刻本，其实当时存世的书棚本唐诗已经没有如此整齐的五十家之多，江氏所用的底本大抵为明嘉靖刻《唐百家诗》。郑文焯致书朱孝臧说，缪荃孙

以明刻唐诗残卷五十家归江标，江据以影刻，并非宋书棚本（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4355页）。缪荃孙《艺风堂日记》有多处记载与江标交易明刻唐人诗集，可见此说并非虚妄。江刻非影宋一事不仅当时多有记述，后来学者如郑振铎、顾廷龙等都曾有说。其实明刻《唐百家诗》历来学者都很看重，版本确实不差，然而迳作宋本则误人不浅。

仿刻本的另一问题是跟底本不符，有的是无意出错，有的是有意校改，却不出校记。王鹏运刻《花间集》内封大书“影宋淳熙鄂州本花间集十卷”，跋语说据杨氏海源阁藏宋刻本“如式影写，付工精刻”，行款、字体确实是仿宋风格。其实王刻与宋刻原本并不一致，颇有错字，最重要的是所据宋本前后缺叶，核其文字，应是据明本抄补，王刻则前后浑然一体，跋语也不说明有抄补，仿佛全书都是宋刻。四印斋刻书的名气和“影宋”之称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学者迳以王刻为宋鄂州本。李一氓《花间集校》倚重鄂本，赵崇祚叙“庶以阳春之甲”六字据鄂本、汤本删去，其实底本此叙系抄补，并非宋刻，所谓鄂本实际是王本，不足为据（详见陈红彦校点本《花间集》校记）。

四、版片衍变

雕版印刷版片刻成后，一般都需要校勘，经过修版校改才正式印书。版片可以随时更动，可以剜版改字，也可以补版或换版，下文统称为改版。版片可以随时更动，随时刷印，不同时间的印本就有所不同，仔细分析就有校样、初印、后印、修版、补版的区别，这关系到对一部书的版本的认识。

最初印本的内封、序跋、题词乃至卷首、附录等往往跟后印本不同，如光绪二十四年刻况周颐辑《薇省词钞》，初印本书前王鹏运题词有衔名，卷十第二十一叶文廷式词有错简，与后来的印本不同。

一部书刻成分发友朋征求齿芬，嗣后增刻序跋、题词，初印本序跋较少甚或阙如就是常情。序跋与原书刻成时间相去一久，字体就有差异。这种情况在诗文集中尤其常见，如传本极罕的丁裔沆《香湖草堂集》据跋应是康熙四十三年刻，所见二本，一本刷印在先，无雍正十一年沈树本序，上海图书馆所藏雍正印本刷印在后则有沈序，沈序字体与全书不同，显然是补刻。然而像谭献刻《白香词谱笺》瞬即补刻李恩绶叙则是另一种情况，如果看不到初印本，就不会知道原无此叙。

道光间刘喜海编刻的《金石苑》系陆续刻版，最终因刘氏去世，没有完工，只存稿本。《中国版刻图录》所收为初印本，此书初印本不分卷，按朝代分为五册，有“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题于来凤堂”刊记。后来从汉至元刻成二百四十二种，又汇刻题名一百五十九种，不仅所收石本种数更多，说明文字也有增补，初刻和补刻字体不同，一目了然。咸丰二年又由胡琨撰序编次为十四卷，未见传本。

后印本内容递增的例子不胜枚举，需要注意分辨。同一种书，内容较少的很可能是罕见的初印本，不要贸然断为缺叶或缺卷的残本。清人文集这种情况很普遍，若不注意还有可能误把后印本年代提前。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康熙刻本只有四十八卷，雍正补刻词二卷总为五十卷，查氏遭难出狱续有诗篇，又刻《续集》六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时只知四十八卷和五十卷是康熙和雍正二本之别，于是逢四十八卷本一律注康熙刻，五十卷本则注雍正增刻，在“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续集六卷”下也注“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却不知其中的《续集》六卷更在五十卷本之后，哪里能跟四十八卷本同庚。

改版更动最少的是仅仅改几个字，最多的是另行刊刻，而卢见曾雅雨堂刻《唐摭言》则介于二者之间。此书有原版和改版两种，原版错误很多，蒋光煦《斟补隅录》曾据朱彝尊藏本予以校正。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三《唐摭言》跋认为蒋校有误，指责“得失以道”条

“未到于天人之际耳”，蒋校所列与原文不合。其实蒋校所据为雅雨堂原版本，叶氏所见则为改版本，二本并不相同。然而改版本虽然书名改为“摭言”，内封却与原版同作“乾隆丙子镌”，字体、版式宛然如一，不比较内容，未必能发现改版本抽换了诸多版片，说是重刻也不为过。此改版本一般谓之重修，如叶德辉跋及戈襄校跋（见严宝善《贩书经眼录》216页），然而以一般意义的修版看待，就要上当。认真的治学之士不可忽视文献资料的版本研究，这也是个很好的例证。

五、修版得失

初印或原版和改版后印的得失，既与改版原因有关，也与着眼点有关，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概括地讲，出于校改讹误或增补内容而改版，一般是得大于失；出于避忌而更改原文，或者是版片毁损，不得不修补烂版，几乎可以肯定是有失无得。

经过覆勘斟酌而主动修版校改讹误，修版后内容应该更为精确。萧穆《敬孚类稿》卷八有《记莫氏旧钞毛诗要义》一文，说萧氏校出样本脱讹有二百余字，刻工没有照改即印出一百多部流传开来。萧氏发现后，命刻工剋改，重印本跟初印本就有差异。同书卷六《跋朱竹垞先生所藏徐常侍集》也说到刻本初印发行后，得到别本重校多有校改的情况。

嘉庆张敦仁仿宋刻《礼记注》，初印本纸墨精良，但是后附《释文》四卷未得宋刻，只好翻印通志堂刻本，版心下没有刻工。十四年后，顾广圻照宋刻《释文》重校修版，以期恢复宋本面貌。再如顾广圻覆刻明嘉靖吴元恭刻《尔雅》，所据底本缺吴元恭序，后来据宋本校改个别文字，又据陈鱣藏本补刻吴序。

像这样改版校字，以及上文所说后印增补篇章，例子举不胜举，从内容上看不妨说是后出转精。但是初印本版面美观，印数不多，更获藏家青睐，如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就称赏张刻《礼记注》

初印本的精美。初印本内容有时别有妙处，治学之士更为珍重，如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乾隆五十一年初印本更接近原稿，而且颇为罕见，就比五十九年校改本可贵。

即使意在校正讹误，修版改字也要慎重。如果师心自用，弄巧成拙，反而有损原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毛氏汲古阁刻《说文》，初印照宋本翻印，毛斧季参考他书一再修版，结果遭到段玉裁的批评，写出《汲古阁说文订》，逐项列举毛斧季第五次修版的错误。光绪淮南书局为此特地重刻前次印本，以期尽可能保留宋本面貌。道光徐楸翻刻《绝妙好词笺》也是一个例子，后印本加上“武林汇勘姓氏”一叶，内容有改字，有校语，多属臆校，没有版本根据，徒乱人意。

因为政治原因而修版改字的情况，出现在清代早期所刻的书中。清朝初期有严厉的思想和文化管制，随着人事和政局的变动，有关的书籍重则禁毁，轻则删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经过乾隆朝明令禁毁，许多书不得不抽掉钱谦益的序言，剗去他的姓名。那个时期的书，字里行间莫名其妙地空白几个字，十之八九是钱谦益惹的祸。个别书还能照原样保留着钱氏文字，则是漏网之鱼，今天的藏家格外珍视，写题跋时都要郑重地写上一笔。

清初各家文集后印本经常因政治风浪而删改文字，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影印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诸集时，特别说明采用的本子没有删改（见《四部丛刊书录》）。但是顾炎武的诗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本虽然号称康熙刻本，其实却是后印修补本，已经不是原来面目（参看徐震堉《梦松凤阁诗文集》259页以下）。

清代刻书的忌讳大抵是政治原因，个别情况则是出于学术思想和人事关系的考虑。如汪中的《述学》中《妇人无主答问》一文重刻本末尾有删节，道光刻本《述学外篇》中《大清故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二文后印本有空白，删节的是过激的词句。

六、版权转移

清代有些书版流传过程多次转手,由于屡屡更改堂号,若不细辨,容易误为重刻,古籍目录中误重印为重刻的情况屡有所见。叶德辉《郇园读书志》卷七《笠泽丛书》跋,说:“大抵版本之学审定至难,往往有此人所刻转售他人,一经改题,而藏书家误以为两人刻本者。就近日所见,如同治甲戌吴门浦氏仿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即购得孙星衍平津馆刻原版,于标目后补刻‘同治甲戌苏城陶升甫摹刻’十一字,前书面改题‘同治甲戌冬月东吴浦氏校定宋本重刊’十六字篆书牌记。上海书估鲍某得秦鉴汗筠斋所刻……汇编为《后知不足斋丛书》。并不述明缘起,而攘他人刻本为己有。若斯之类,苟非字字比校,并其版匡墨线逐一细勘,又谁从而发其覆、穷其根也?”

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集有《唐诗鼓吹》跋,历述清顺治陆貽典刻本后印本的演化,一本封面题乾隆十一年新镌,堂号为怀德堂,然而内有钱谦益序,“玄”字也不缺笔,其实仍是顺治旧版。后来去掉钱序,封面改题赵松雪先生原本,又改题乾隆壬午年新镌,堂号改为光霁堂,最后加题敬业堂。仍是同一副版片,不过后印者有补版而已。

《吹网录》卷四载,顾广圻曾撰序影刻明嘉靖吴元恭本《尔雅》,并刻戈襄跋,有戈襄、钮树玉、袁廷桢、张敦仁等印章。后来把版片送给门人程稟初,程氏把顾氏思适斋刻款改为“澹意轩重刊”,并削去顾序、戈跋及袁、张、钮各印。

这里再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都有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本为雍正四年赵孟升刻版,因生事故,加上雍正六年濮梁序而成濮梁印本。乾隆十年双桂草堂沈尚杰修版重印诡称“重加校讎,付之剞劂”,乾隆六十年沈炎耆英堂修版再印,其实都是修版重印,并非重刻。按说此事劳权和章钰已经申明(见章

钰《读书敏求记校证》),一些目录却依然著录为双桂草堂刻本或耆英堂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未能免俗,仍著录为沈尚杰刻本。

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是清康熙二十四年柯氏小幔亭刻周密辑《绝妙好词》,版片后归高士奇,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修版加跋,柯氏原序或删或改,又剋改“小幔亭”为“清吟堂”,一变而为高氏清吟堂刻本。此版内封后来又改为小瓶庐藏版,于是一些古籍目录又有所谓小瓶庐刻本。此版虽有三种印本,然而极其罕见,厉鹗在康熙末年即慨叹难得,获一残本抄写补足,其中小幔亭印本尤其珍罕。词学和目录学工作者难得并几比较的机会,于是三种印本文献中就传为三种刻本,即以富藏词集著称的李一氓的《一氓题跋》也不知此情。更可怪的是,冷红词客江炳炎雍正七年跋项刻,相去仅仅三十来年也不了了,竟然说《绝妙好词》“一雕板于禾中柯孝廉南陔,重刻于高江村学士”(见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227页)。往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油印征求意见时,作者曾告以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此《绝妙好词》的版本就是一项。可惜定稿时,删去小瓶庐刻本,而清吟堂刻本仍在。其实后两种改称印本即可,原不必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者注意,这里不能不再次说明。

七、刻书年代

一般而言,确定清版年代时有刊记可据最为理想,然而尽信刊记却常常误人。最常见的错误是,初刻之后续有增补,刊记未改,结果内容与刊记年代不合。如张鸣珂的《寒松阁诗》八卷和《寒松阁词》四卷都非一时刻成,然而一直使用旧日的内封:诗集内封署光绪十九年,当时只有四卷,卷八的作品已收至光绪三十二年;词集内封署光绪十年,当时只有二卷,第四卷已经有光绪二十七年的作品。《中国丛书综录》和所见其他书目大抵都按内封年代著录,却不

知名实不符,需要纠正。

如果书中没有刊记标明刻书年代,确定年代时通常只好借重序跋年代。然而序跋落款年代有多种情况,既不一定是定稿的时间,也不一定是刻书的时间,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书刻成后随时可以增补,增补本的年代就跟初刻序跋年代不同。如汪士慎《巢林集》七卷,前有乾隆九年陈撰的序,说书已刻成。《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年版)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据以著录为乾隆九年刻本。其实乾隆九年陈撰作序时是初刻四卷本,后三卷是以后补刻。四卷本卷四收诗六十七首,与七卷本不同。道光十三年金楷用原板重印有跋,《贩书偶记》则误据此跋著录为道光十三年刻本。

清汪中的《述学》是一个版本不明的例子。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十《述学》跋中列举了七种刻本,比较各本内容异同也很详尽,所以当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接引用其说,未加更改,然而他对《述学》的版本鉴别却有重大错误。叶氏说大字三卷本是汪中自刻的第一刻本,阮元《小嫔嬛仙馆叙录书》本是第二刻,汪氏问礼堂刻宋体小字四卷本是第三刻。叶氏此说深入人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著录大字三卷本为“清汪氏自刻本”,排在其他各本前面,四卷本排在道光本后面。正式出版时有所保留,大字三卷本改称“清刻本”,但是各本座次仍旧。其实种种事实表明,大字三卷本应该是汪中去世后他人代编的第三刻本,小字四卷本应该是汪氏自刻本。

据包世臣《艺舟双楫》卷三《书述学六卷后》所述,乾隆五十五年汪中自取说经辨妄之文,并杂著传记若干篇,以“述学”为名自刻二卷行于世。嘉庆六年包氏到扬州,初得阮刻本,继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与阮本无异”。汪中去世前已将书稿交刘端临编订,嘉庆十年刘氏病笃由包氏编订为“汪容甫文集”正集三卷、别集一卷。

包氏所说汪中乾隆自刻与阮本无异之小字二卷本,未见著录。

今日所知,只有叶氏所谓第三刻,即汪氏问礼堂刻宋体小字本,内容与阮本无异。此本内篇三卷外篇一卷,分卷与阮本不同。汪中之子汪喜孙重编《述学》时不改此本编次及版式,种种迹象表明此本应是汪中自定,即《述学》第一刻本,包氏所谓汪中自刻小字二卷本应即此本。上海图书馆藏此本为秦更年旧藏,前有阮氏擘经室藏印,秦氏题为《述学》第一刊本,应该不误。

叶氏所得此本有王念孙嘉庆二十年序,叶氏据此定为嘉庆二十年刻本。据汪喜孙《孤儿编》中《先君遗文书后》一文说,嘉庆十九年已经编定六卷本,不久即刻成圆体字本行世,看来不会在嘉庆二十年以宋体重刻旧日之本。阮元旧藏系初印本,无王念孙序,王序应是后来补刻,叶氏据此序断定版刻年代,得出错误的结论。序跋跟刻版不一定同时,版本鉴定的许多错误大都源出于此。

大字三卷本内容与阮刻完全不同,据包世臣所记绝非汪氏自刻本,秦更年归为刘端临编定。或许包世臣也曾与有力,年代应在嘉庆十年前。秦更年曾得大字三卷本校样,书名原为“汪容甫集”,校改为“述学”。秦本今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汪容甫集三卷清刘台拱刻本”,其实此本与《述学》大字三卷本是一回事,不应该劳燕分飞。

八、翻版重刻

翻版重刻大多是重新写样,行款字体都不一定跟原版相同。不过也有一些书是仿刻或直接用原书覆刻,如淮南书局就曾覆刻《复古编》、《东都事略》、《四书章句集注》等,甚至原书刊记也照刻,只是封面写明淮南书局刻,版心下方有刻工名,可据以分辨。

翻刻本以原书上版时,印本酷似原版,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一个最令人迷惑的例子是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虽历经学者考索,至今犹有剩义。此书最初有吴门顾樾碧筠草堂仿元刻本,王岐手写上版,扬州陆钟辉水云渔屋随即如式翻刻。陆系覆刻,字画略瘦,两

副版片不同,应该不会混淆。但是顾刻堂号为碧筠草堂,而陆版堂号却有碧筠草堂和水云渔屋两种,不同印本扑朔迷离,长期以来学者没有确论。叶德辉所藏所见至少有六七本之多,《郇园读书志》卷七有跋三篇反复考索,仍为堂号所惑,错误地认为水云渔屋本乃陆本初印,碧筠草堂本乃陆本稍后印。秦更年和吴庠都精于版本之学,本来已经定碧筠草堂为顾刻,水云渔屋为陆刻,但是突然获见一本版为陆刻,却有碧筠草堂封面,二人踌躇之后,断为陆氏初印本封面确作碧筠草堂,后来改刻水云渔屋(参看《青鹤》一卷三期《婴阁书跋》)。王大隆《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引证与顾、陆同时的姚世钰《孱守斋遗稿》中的记载,说明顾、陆二刻的传刻实情。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顾氏碧筠草堂和陆氏水云渔屋两刻,其实二者关系十分复杂,封面和钤印有许多花样,还有隐情为今人所不知,梁颖先生将撰文详考,此处不赘。

顾广圻思适斋影刻明吴元恭本《尔雅》是清刻佳本,翻刻本则亦步亦趋,顾氏刻本内封及款识一应俱全,骤然一见很难分辨。但是翻刻本卷末虽照刻“刘文楷刻”一行刊记,而刀法生硬,字迹呆板,不像名工之作。如果取原本并几比较,孰为原版,孰为翻版,立见高下。今日所见此书多为翻版,而且少有人知有原翻之别,目录著录的本子大抵为翻刻本,却都混称顾刻,不能不特别注意。

重刻本内容不一定跟原刻完全相同,治学之士不能不三致意焉。清周济撰《词辨》二卷道光二十七年潘曾玮初刻,光绪四年重刻本下卷苏轼《贺新凉》“乳燕飞华屋”易以李玉之作,卷末增刻张翥《多丽》和康与之《宝鼎现》各一首,无重刻说明,不知其本所出。徐珂刻谭献评本则依道光原刻,与重刻本不同。近年出版的《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未辨各本异同,指谭评本更改原书,显然是误以为光绪重刻本直翻道光本,不知二者有此差异。此书道光本颇为罕见,通常所见都为光绪本,为免传讹,特据潘曾玮养闲草堂自藏初印本,予以更正。

九、丛书子目

清版丛书情况最为复杂,确定子目和版本都非易事。许多丛书是随刻随印,子目多少不一。如康熙孙默辑刻的《国朝名家诗余》,开始是三家,继刻三家为六家,续刻四家为十家,最后刻至十七家,历次印本家数多少不等,不能简单地以完缺论。聂先和曾王孙辑刻的《百名家词钞》情况更为复杂,详情迄今不明。罗振玉辑刻的《玉简斋丛书》初印皮纸刷印本八册,后来陆续增刻,重编目录订为二集。二集本也不是一种印本,其中《山中闻见录》初刻有缺卷,后来补足别行,并未及时汇入丛书。

丛书往往没有全书总刊记,即使有刊记一般也不能反映其刊刻历程。《彊村丛书》从清末开始刊刻,除《东坡乐府》、《梦窗词集》等有单行本外,其余按天干编次陆续分集发行,积至八集三十二册,经过重修校订编为四十册,内封刊记为“壬戌十月三次校补印行”。嗣后仍有校修和增补,刊记却始终未改。后人论著中混称为“民国十一年校补本”,其实不同时期的印本内容并不尽同。

既然可以随刻随印,并非一律汇刊,于是单行本或抽印本是否算丛书零本而不予著录就值得考虑。《贩书偶记》收丛书初印单行本或抽印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例是清代丛书零种不收。这里不能不注意,一是丛书子目表不一定准确,本来单行的书编目时有可能当作丛书本而不收录;二是在整部丛书十分罕见、单行本也稀罕时,有可能埋没善本;三是版片本身也会有衍变,单行或抽印不一定跟丛书本完全一致,考察版本时不要忽略单行本。

例如按照《中国丛书综录》,道光二十八年刻《连筠簃丛书》子目有《说文解字义证》和《永乐大典目录》,其实这两种书是最后刻成,不在道光二十八年汇印本之中。即使后来确有汇印本《连筠簃丛书》包含这两种书,也不宜归入丛书本而不作独立的版本。道光所刻的一些丛书,如《春晖堂丛书》、《小石山房丛书》、《玉函山房辑

佚书》、《别下斋丛书》等，今天所见大抵为兵燹之后补版汇印本，初印原本则更为珍贵。在确定清版善本时，这些问题就需要考虑。

十、版本辨伪

仿宋刻本有重刻序跋或刊记，去掉就有可能伪充宋刻原本。旧书肆所谓捺印本或垫印本就是垫纸遮去翻刻痕迹的印本，清通志堂刻《经解》和黄丕烈士礼居仿宋本就有这种情况。清康熙张士俊泽存堂仿刻宋本，也常被当做宋刻原书。不仅民间误认，连清内府藏本也不乏其例。

叶德辉《郇园读书志》卷一《通志堂汇刻经解》跋说：“甲午三月，今上命南书房翰林检查天禄琳琅藏书。长沙张冶秋、福山王莲生两祭酒皆与其事，据云《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所载无一册之存，《续编》经部宋人书所谓宋版者往往以白纸初印之通志堂本伪充。”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著录乾隆御笔题诗《尚书详解》，说：“是书通志堂经解内翻刻，此其原本也。”其实此本正是通志堂刻本，2000年嘉德秋季拍卖会632号拍品即此书。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著录乾隆御笔题诗《佩觿》，说：“是书近张士俊泽存堂有仿宋刻，此本白麻纸浓墨，极为古致，中于仁宗嫌名‘贞’字、‘徵’字俱阙笔，而……神宗正讳、钦光二宗嫌名皆不阙笔，乃北宋治平中槧可证。”其实此本正是清康熙张氏泽存堂刻本，1996年嘉德春季拍卖会546号拍品即为此书。

作伪的事情有清一代屡见不鲜，文献时有所记。缪荃孙说，嘉庆年间苏州彭氏刻《论语》、《孟子》，作伪得善价（《历史文献》第一辑168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说，顾鹤逸藏《尔雅》题宋刻本，实际是清刊本（118页）；《孔子家语》光绪壬辰上海扫叶山房照宋本缩印翻刻本，仅值一金，书贾用旧纸摹印冒充古本，以二百金售给徐敬宜（532页）。

清初覆宋刻史弥宁《友林乙稿》，许多藏家误作宋刻原本，而宋

楼旧藏所谓宋本就是此本(参看《藏园群书经眼录》1264页),魏隐儒和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151页)记所见五本各家多误作宋本。民国初年袁克文影印真宋本行世,此书真相大白。清康熙锡山王氏覆宋刻《徐节孝集》,也曾被人误作宋本珍藏,见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151页)。

仿刻和影刻之书伪作原本的伎俩可以得逞,固然有作伪手段多样、诡诈百出的因素,对历代刻本的形式和内容缺乏认识,没有进行细致的观察研究,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无论怎样刻意模仿,清刻本的字体、刀工、纸张和刷印都跟宋元本不同,只要认真看看就不会跟古本混淆。往年见到一部《扬子法言》,有董其昌印记,书叶虫蛀裱褙,似乎旧书模样。且不说形制细节,卷十三第三叶版心下“宋槧缺叶依何屺瞻传校本补”两行字还在,这是清嘉庆秦恩复覆宋本的标记,作伪者对《扬子法言》一书未免过于无知。

十一、活字印本

活字版照例是随排随印,印完一版,及时拆版,以便排印他叶。下次再印要重新排字,跟印新书一样费工。所以活字本印数一般一次印足,很少重印。由于是一次刷印,印本内容应该相同。然而清内府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同一种书文字有时并不尽同。不妨举两个例子。

郭书春先生整理《九章算术》时,曾下工夫搜寻不同的版本,结果在南京博物馆看到了旧藏避暑山庄的聚珍版《九章算术》御览本,经过比勘,发现此本错字较他本为少,显然不是同一次印本。

另一个例子是《直斋书录解题》,往年梁启超作《稼轩词》跋,说《解题》记载辛词作一卷。后来学者大多说《解题》著录辛词实作四卷,指梁说为误。《解题》有多种版本,虽都出自武英殿本,但是外间印本文字或有校改,并不尽同内聚珍原版。学者所据版本不同,文字有出入可以理解,不料复检各馆所藏内聚珍原书却发现也有作

一卷、作四卷两种文本。虽然内聚珍本同书异文的详情尚待研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工作时却不能不对版本差异有所警觉。

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是文献学的重要领域之一,由于它跟古籍收藏和赏鉴关系密切,对读书而言似乎是偏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学者治学偶然涉及,也是以余力为之。由于主观投入不足和客观条件所限,古籍的版本研究目前仍然处于经验积累阶段,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总结。本文琐琐不足道,聊以清版点滴所见就教于并世大方之家。

参考文献(以引用先后为序)

- 郎园读书志 叶德辉 1928年长沙叶氏上海澹园排印本
藏园群书题记 傅增湘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 台湾中央图书馆
不下带编 金埴 中华书局
经籍跋文 陈鱣 清道光别下斋刻本
词话丛编 唐圭璋辑 中华书局
艺风堂日记 缪荃孙 北京大学出版社
花间集校 李一氓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花间集·尊前集 陈红彦、唱春莲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版刻图录 北京图书馆 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斟补隅录 蒋光煦 清光绪别下斋重刻本
贩书经眼录 严宝善 浙江古籍出版社
敬孚类稿 萧穆 黄山书社
艺风藏书续记 缪荃孙 1913年缪氏自刻本
四部丛刊书录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梦松凤阁诗文集 徐震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双行精舍书跋辑存 王献唐 齐鲁书社
吹网录 叶廷琯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读书敏求记校证 章钰 中华书局

一氓题跋 李一氓 三联书店

故宫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 台湾故宫博物院

中国丛书综录 上海图书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 北京图书馆 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贩书偶记 孙殿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齐鲁书社

艺舟双楫 包世臣 黄山书社出版《包世臣全集》本

孤儿编 汪喜孙 秦更年等辑《重印江都汪氏丛书》本

青鹤(第一卷第三期) 青鹤杂志社

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 王欣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人选评词集三种 尹志腾校点 齐鲁书社

天禄琳琅书目 中华书局

历史文献(第一辑)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 魏隐儒、王金雨 印刷工业出版社

善本书所见录 罗振常 商务印书馆

九章算术 郭书春汇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